

南京师范大学国家“211”重点建设项目
江苏省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从“中间地带”到 “世界多极化”

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

孙建社 石斌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中间地带”到 “世界多极化”

孙建社 石斌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孙建社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01-003841-4

I. 从… II. 孙… III. ①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思想-研究
②邓小平-国际政治-战略思想-研究③江泽民-国际政治-战略思想-研究 IV. A841.64②A849.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249 号

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

——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

CONG “ZHONGJIAN DIDAI” DAO “SHIJIE DUOJIHUA”

孙建社 石 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33 千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3841-4 定价:20.00 元

前 言

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多年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三代领导核心都始终在领导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殚精竭虑、运筹帷幄。

中国三代领导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和阐述大都体现在他们的著作、讲话及各种形式的言论中,内容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阐述世界政治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中包括对国际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相互矛盾和消长变化的认识;二是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论述,主要包括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外交目标、外交政策和策略等等。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这两大内容可通称为国际战略思想。

虽然人们对“国际战略”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大致都认为,“国际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¹严格说来,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国际战略是国家对较长时期的国际格局、对本国较长时期内主要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际活动总路线的认识和谋划。外交政策是根据本国的国际战略、国家利益、一定时期的国际环境所确定的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的原则和方针。前者是对世界全局的分析和综合考虑,而后者是一国对外行动的方

针和准则。但两者同属于国家对外活动的谋略范畴,具有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²由于国际战略是关于国家对国际活动总的全局认识和谋划,因此它决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实施国际战略的具体方针和原则。就此而言,外交政策从属于国际战略,是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就是基于这一认识,把中国三代领导人关于国际问题的两大论述内容统称为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并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外交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策略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奠基者和决策人。³他根据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中间地带”、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一方面指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主要力量和主要矛盾,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创立了新中国的外交理论,确立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型外交,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全面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1995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⁴邓小

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他在冷静观察和深入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果断地指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为我国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他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而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了正确的定位,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政策,明确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外交目标,进一步丰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邓小平的主持和驾驭下,中国外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了同苏联的正常关系,改善和促进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周边国家普遍建立了睦邻互信合作关系,开创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周边环境,同时又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先后同英国、葡萄牙达成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协议,为港澳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从中华民族跨世纪的复兴伟业和世界和平的前途相统一的高度,展开了气势恢弘的外交活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21 世纪世界发展和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主张。其中深刻揭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和人类文明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以及这种新秩序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本质特点;提出各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实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全面构筑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为世界多极化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些思想使

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求和平、求平等、求合作和求发展的时代精神。这一国际战略将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提供长远而又重要的战略指南,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同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重振雄风,尽快成为多极世界中倡导正义、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一极。

纵观三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新中国 50 多年来的对外关系实践,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基本的结论:

其一,三代中国领导人始终把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所要实现战略目标。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所阐述的具体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他们研究种种国际问题的起点和目的都是共同的,就是尽力争取维护世界和平。这不仅可以从他们众多的论述看到这一内容,而且也可以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得以体现。

其二,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新的战略主张,适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三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每一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本身都是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和升华的,后代领导人对前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因而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其三,从广大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视角、国际处境和利益需求出发,努力倡导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将多极化发展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并最终建立公正、合理、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三代领导人一脉相承的国际战略思想。

最后,我们还可得出一条最重要的结论:三代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外交的实践还表明,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全面走向世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提是不断改变自己、发展自己。从新中国 50 多年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外交舞台越来越广阔,朋友越来越多,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影响也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一个开放的中国对中国自身和世界都有好处。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加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也顺应了世界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潮流。江泽民指出:“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总之,“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⁵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⁶中国在改变自己、改变自身的面貌、改变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一个和平、民主、繁荣、开放的中国是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 1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3 页。
- 2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第 77 页。
- 3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 4 京湘、姚尧:《第三代领导外交实录》,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 页。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188 页。
-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3 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一边倒”方针: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	(1)
一、走进历史深处:毛泽东早期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	(1)
二、“一边倒”: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确立	(12)
三、对“一边倒”战略的几点认识	(23)
第二章 “三种力量和两类矛盾”的分析: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	(41)
一、“三种力量和两类矛盾”的分析	(42)
二、“两个中间地带”是中国可以团结的力量	(44)
三、“两面开弓”:中国外交在曲折中前进	(47)
第三章 “三个世界”的划分: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	(58)
一、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	(58)
二、“三个世界”理论及其意义	(62)
三、联美遏苏的“一条线”战略	(70)
四、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多极化思想	(75)
第四章 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	(89)
一、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	(89)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问题	(97)
三、和平与发展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13)

第五章 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	(123)
一、世界格局呈多极化发展趋势	(123)
二、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小国	(133)
三、中国应发挥与国力相适应的大国作用	(140)
第六章 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系统	(152)
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	(152)
二、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157)
三、建立国际新秩序	(167)
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与各国友好合作	(178)
五、对外开放	(186)
第七章 独立自主: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199)
一、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历来坚持的基本原则	(200)
二、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05)
三、独立自主原则在党际关系中的运用	(215)
第八章 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223)
一、用“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一些国际争端	(224)
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231)
三、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239)
四、“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246)
第九章 顺应世界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潮流:世纪之交的中国对外战略	(255)
一、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258)
二、巩固睦邻友好环境;构筑周边安全机制	(275)
三、提倡世界多样性;推动多极制衡国际格局	(288)
后 记	(315)

第一章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一边倒”方针：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实践，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

一、走进历史深处：毛泽东早期 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

1.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斗争与联合等等矛盾，都有深刻独到的分析和把握；它不仅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哲学思想和传统智慧、谋略的精华，也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它既有“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的战略全局意识，也有“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等具体实用的策略艺术。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种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形成和不

断深化的过程。它最初是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处理同美苏等大国的关系的过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日益分裂为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两大完全对立的集团。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如何正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从而确立我党今后的首要任务，已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成为团结的对象，并开始积极对外宣传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在延安接待了以斯诺为首的一大批国际友人，使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他指出，今天中国人民面对的最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受到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愿意和美、英、法等国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他还断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使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在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原则，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关系，维护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50多个国家之间，有联合、有矛盾、有斗争、有妥协，关系错综复杂。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始终是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和利益角逐的场所。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注视着国际风云的变化，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巧妙地处理了同美、苏等大国的关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并在同大国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将这些经验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国内革命斗争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国际战略思想,为未来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始的。由于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仍然是国民党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并非执政党,缺乏以国家代表身份处理外交事务的必要条件,因此共产党人的许多外交活动受到不少制约。周恩来曾经指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还是“半独立的外交”。¹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仍然高度重视外交工作,抓住一切机遇开展对外交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努力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支持。

1944—1945年是毛泽东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由于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美国。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记者团除了一名苏联记者,其余大部分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记者。毛泽东还单独会见了美国记者史坦因,在会谈中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

1944年美国政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到延安,与中共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这一举动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了借此机会同美国建立起持久的、积极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由于正值美国建国168周年,延安特地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指示撰写并亲自修改的社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高度评价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盛赞华

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并表示，“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深望罗斯福总统能够长期坚持“美苏英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的外交路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要求把观察组的到来看作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为了使美方了解我党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谈话，内容不仅涉及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还涉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中美关系。毛泽东当时还强调，应该“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也向美国提出援助我们的要求”。

抗战期间毛泽东的另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是1944年11月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判，经过我方艰苦努力，双方就建立联合政府问题达成了协议。毛泽东在协议签字后曾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对罗斯福的努力表示感谢。信中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具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们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还有很多，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端。但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曾经真诚地希望与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我党尽管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但还是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出发，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内政

治中的党派利益，努力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发展友好关系。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很快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在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最终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毛泽东在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取得了重要的外交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后来的战略选择以及一系列战略思想与外交方针的部分远因。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交往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的对华政策当时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支持中国革命，并曾给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极大的支持。苏联的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干涉。但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也带有严重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也时常横加干涉。在国共两党之间，斯大林同样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还不顾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力图借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拖住日本。1942年夏天，斯大林几次要求中共将部分兵力调往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目的是以此吸引德国人的注意力，减轻德国对苏联的夏季攻势。由于毛泽东没有答应这个要求，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不满，他甚至对赫尔利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共产党。”在雅尔塔会谈中，斯大林为在中国领土上谋取利益而同美国进行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抗战胜利后，苏联甚至曾敦促中国共产党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这自然也是我党所不能答应的。²

尽管如此，中共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斯大林和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错误，相反，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和感谢苏联对中国革命

的声援和支持。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抗战的极大支持。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重性,应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尽可能消除其不利因素。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在争取苏联支持的同时,也坚决抵制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并利用苏美、苏蒋之间的矛盾,力求妥善处理同苏联的关系,目的是增强中国革命的力量。

2.“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苏交往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后来提出中间地带理论的一些思想动因。

早在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就看到了亚、非、拉地区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与全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把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斗争都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也把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确立,世界走向新的战略格局,中国共产党在两极对抗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根据他对矛盾哲学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利用纵横交错的矛盾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外交中的原则同在国内的原则一样,依然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此,必须“分清敌我友”,必须考虑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把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根本利益区别开来,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首要敌人。中国内战的爆发,宣告美国“调停”的失败,也表明了中国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全面恶化。就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